

杨 宽 / 著

杨 宽

古史论文选集



湫渊

嗣王 壽申 吉

不顯 大禘 又湫 吉

不顯 大禘 又湫 吉

不顯 大禘 又湫 吉

不顯 大禘 又湫 吉

不顯 大禘 又湫 吉

不顯 大禘 又湫 吉

不顯 大禘 又湫 吉

不顯 大禘 又湫 吉

不顯 大禘 又湫 吉

K220.7-53/6

杨 宽

古史论文选集



杨 宽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湫淵

王 壽 申 吉

不 顯 大 禘 祝 司 壽 壽

泉 相 止 多 自

召 及 橙 成

兩 半 尊 壺

樂 盟 日 某 壽

不 杉 親 卯 大 湫

烹 今 禮 王 壽 相 壽

至

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宽古史论文选集/杨宽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杨宽著作系列)

ISBN 7-208-03717-5

I. 杨... II. 杨... III. ①杨宽-文集②中国-古代史-文集 IV. K2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7052 号

责任编辑 刘 影

封面装帧 杨德鸿

**杨宽古史论文选集**

杨 宽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25 插页 1 字数 595,000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7-208-03717-5/K·882

定价 52.00 元

## 序 言

我少年时代在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苏州求学，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又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励，特别是受到三次古史大辩论的启示和新学派兴起的影响，很早就走上研究古代文化历史的道路。

先秦诸子中，我向来认为墨子最杰出。当1929年，我读高级中学时，已开始对《墨子》和《墨经》作探索。因为看到当时许多学者对《墨经》随意改字，不顾上下文句，作出种种不同的新解释，为了想纠正这个不良学风，写成《墨经校勘研究》一文，投寄北平燕京大学的《燕京学报》，当即收到学报主编容庚的亲笔回信，认为论文很有见解，切中时弊，准备采用，但因自下一期起，改由顾颉刚任主编，原稿已转交给顾先生，今后请直接与顾先生联系。我接信后十分高兴，认为既经决定采用，我自己毕竟还是个中学生，可能文章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因而立即写信给顾先生，说明自己是中学生，如有不妥之处请发表时改正。此信寄去后不见回信，等到新的一期学报出版又不见刊载。我为郑重起见，再写挂号信给顾先生催询，并且说：“如果不能发表，请把原稿退还，因为我没有留下底稿”，又是长期得不到回音。我感到十分遗憾，第一次写成的论文就如石沉大海那样消失了。我从此没有对这件事作进一步的追问，我想顾先生将来会后悔的。直到七年之后，1937年春天，童书业（丕绳）写信到上海市博物馆来，为《禹贡》半月刊约稿，我当即寄去《说夏》一文，发表于《禹贡》第七卷第六、七期合刊。发表时承蒙顾先生特别加上编者

按：“颀刚按，杨宽正先生用研究神话之态度以观察古史传说，立说创辟，久所企仰”云云。我就意识到，该是因为七年前扣压我投寄《燕京学报》原稿的事感到抱歉了。后来与童书业谈论到这件事，果然如此，是顾先生委托童书业为《禹贡》约稿的。我想可能顾先生顾虑到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一个中学生的文章评论不少名家的失误，怕出什么问题；又因为容庚已有回信，又不便退稿。在三十年代中，顾先生向来以能够提拔青年学者和没有学历的人才著称。我今天重提此事，因为现在我编论文集没有我所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不免感到有点遗憾。

我从1932年12月起，一年内先后发表了七篇墨学的论文。我很赞成梁启超在《墨经校释》中把“端”解释为物质粒子，这种物质粒子具有不可分割性，是与古代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同样的主张。墨家认为世界万物是由各种不同性质的物质粒子经过五种不同的组织结合方式组成，其中最主要的组织结合方式是“盈”，还举出一个例子，认为“石”是由有“坚”的属性的物质粒子和有“白”的属性的物质粒子相“盈”而构成。这个学说为名家公孙龙所反对，《公孙龙子》有一篇《坚白论》，就是针对墨家这个学说的；认为“坚”和“白”在“石”中是相“离”的，不是相“盈”的。关于“盈坚白”和“离坚白”的辩论，曾哄动一时，引起当时文化学术界广泛注意，就是因为这是有关物质世界如何构成的重要问题。

对于墨学，我认为应该进行分期的研究。《墨子》是墨家学术论文的汇编，《亲士》、《修身》和《经上》是开创时期的作品；《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命》等上、中、下篇，是发展时期的作品；《大取》、《小取》和《经下》是辩论时期的作品。我认为《经上》和《经下》不是同时的作品。《经上》是墨子自著，原是墨家的经典著作，所以所有文句是“定义”形式的。《经下》当是后期墨家中一派领袖的著作，是申

说《经上》的内容的。因此我把《经上》篇分成十五章加以解释，每章加出了标题，如“知识论”、“德行论”、“人生论”、“言谈论”、“宇宙论”、“辩说论”等等，称为《墨经哲学》，1942年由四川重庆的正中书局出版，从此我对《墨子》的研究告一段落。出版时正当抗日战争期间，作者误印为“杨霓”，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詹剑峰《墨家的形式逻辑》都引作“杨霓”。抗日战争结束后上海正中书局出版此书仍作“杨霓”。经我写信去要求更正，才把“霓”字贴改为“霓”。现在台北正中书局继续发行此书。由于作者人名印错，学术界许多人不知道我曾著此书。

从1933年春天起，我的研究重点从《墨子》转移到古史传说。1923年由于顾颉刚提出了“大禹是虫”的见解，引发了一场古史传说真伪的大辩论，顾颉刚因此出版了他的名著《古史辨》第一册。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推翻了三皇、五帝、尧、舜、禹的伪古史系统，在史学界成为“疑古派”。我认为“疑古派”的重要贡献，就是指出了古史传说中的禹是出于神话的演变，缺点是没有完全脱出“今文经学”的成见束缚，没有充分运用“神话学”作为武器，对古史传说作系统的考辨，因而没有把全部古史传说还原为神话。我认为古史传说系统的形成，主要是长期经过分化演变的神话所组成，由此可以开辟一个探讨中国古神话的园地。到1935年下半年，我已经分别以古史传说中的人物为中心，对他们的神话来源及其分化演变，提出看法，写成不少笔记。从这年冬天起，友人郑师许邀请我合编华文《大美晚报》副刊《历史》周刊，我就把所写这方面的笔记陆续发表，对盘古、三皇、五帝、鲧、禹等等的传说都作了分析。有的进一步写成系统论文，如《三皇传说之起源及其演变》（发表在1940年4月出版的《学术》上）、《丹朱、驩兜与朱明、祝融》和《鲧、共工与玄冥、冯夷》（发表在1939年出版的《说文月刊》上）、《伯益考》（发表在1941年出版的《齐鲁学报》第1期）。所有这些文章后来汇

编成为《中国上古史导论》一书，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上编，此中《伯益考》改题为《伯益、句芒与九凤、玄鸟》。

抗日战争初期，从1937年8月到1938年暑假，我在广东省立勸勤大学教育学院文史系教书，把《中国上古史导论》作为讲义。1938年暑假回到上海，在光华大学和诚明文学院教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上海租界，我就隐居在青浦白鹤江镇家乡从事《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的编辑考证，先后共二年又九个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三年半时间我忙于恢复上海市博物馆的工作。当时还以博物馆研究室名义在上海《中央日报》副刊《文物》周刊发表文章，前后共出一百二十多期，我曾发表了一批谈论文物的文章。在1946、1947年间还在上海《东南日报》副刊《文史》周刊和《益世报》副刊《史苑》周刊上发表了《战国史事丛考》共二十七篇。五十年代我忙于从事创建上海博物馆的工作，曾主持编辑《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和《上海博物馆藏画》两书的出版，因印刷费时，延至1964年才出版。1954年夏天我乘休假期间，把《战国史》的讲稿作了补充修订，次年在上海出版。

我早年就与友人童书业（丕绳）约定，彼此研究分工合作，他在顾颉刚的指导下从事春秋史的研究，我独立从事战国史的研究并兼及西周史的研究。童书业在1941年所作《春秋史》序言中，就曾讲到他同我的《战国史》“可以合成《春秋战国史》一书”。后来因为他离开上海博物馆到山东大学当教授，彼此分手了。

关于西周史的研究，我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发表了探讨农业生产、井田制度、乡遂制度、宗法制度、大学特点以及籍礼、冠礼、大蒐礼、乡饮酒礼、射礼、贄见礼的文章，1965年汇编成《古史新探》一书出版。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我就在这个基础上撰写《西周史》，此中不少章节曾作为论文先在杂志上发表，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如《西周初期东都成周的建设及其政治作

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教学问题》1973年第4期)、《西周中央政权机构剖析》(《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西周王朝公卿的官爵制度》(《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西周史研究》)、《西周初期的分封制》(《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上册,1990年出版)、《论周武王克商》(《神与神话》,1988年出版)、《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五辑,1995年出版)、《曾国之谜解释》(《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西周时代的楚国》(《江汉论坛》1981年第5期)。

我七十年来发表的长短文章有二百二十多篇,散见在报刊杂志上,为读者方便起见,编辑出版这部《古史论文选集》,选的首要标准是较有学术价值的。例如,古史传说中,我主要挑选了四季之神的神话传说,因为这是同近年新发现的《楚帛书》所载四季之神的创世神话密切相关的。又如战国史事丛考,我在《战国史》中都已约略谈到,我只选取了讨论有关梁惠王年世和越国灭亡年代等的文章,因为这两个问题经过这样进一步的讨论,都已经成为定论了。凡是论文的主要论点,《西周史》和《战国史》中已经基本说明的,就不再收入。

此选集共分九卷。卷一主要探讨古代农业生产发展的课题,包括土地制度、农业政策等各方面的成就。中国在这方面很早就有高度发展的水平,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经济文化有着高度发展的成就。卷二编入了讨论西周时代与社会组织、军队编制密切相关的“乡遂制度”的文章,又编入了西周、春秋和战国、秦汉间从分封制演变为郡县制等文章。卷三编入《商代的别都制度》和《西周列国考》二文,商代有别都制度是前人没有谈论到的,正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在为我的《中国都城的起源和发展》一书日译本所写序文中所说:“商代的都城制度是一种陪都制,这与历来认定的商代一都的观点是迥异的。”至于《西周列国考》,考定西周时代存在的列国和部族多到一百七十多个,更是



前人未曾考究出来的。卷四是有关战国史事的文章。卷五编入了讨论有关四季之神的神话以及古史传说中的神话问题。卷六编入了文物丛考。卷七编入了月令考。要特别指出的是,《诗经·豳风》的《七月》篇,是西周时代豳(今陕西彬县北)地农民所作按时令进行农事与生活的诗歌;《大戴礼》的《夏小正》是春秋时代农事的月历;《礼记》的《月令》是战国时代的农事月历,三者一脉相承,我们可以由此看到土地制度和耕作技术上的发展变化。卷八、卷九编入有关墨学和先秦诸子的问题。

杨 宽

# 目 录

序 言	1
卷 一	
重评 1920 年关于井田制有无的辩论	3
云梦秦简所反映的土地制度和农业政策	17
释青川秦牍的田亩制度	35
卷 二	
论西周金文中“六自”“八自”和乡遂制度的关系	43
再论西周金文中“六自”和“八自”的性质	54
春秋时代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	61
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发展演变	84
战国秦汉的监察和视察地方制度	94
从少府职掌看秦汉封建统治者的经济特权	113
论秦汉的分封制	130
卷 三	
商代的别都制度	149
西周列国考	161
卷 四	
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	247
论梁惠王的年世	265
再论梁惠王的年世	272
楚怀王灭越设郡江东考	278

	关于越国灭亡年代的再商讨·····	285
<b>卷 五</b>		
	伯益、句芒与九凤、玄鸟·····	297
	丹朱、驩兜与朱明、祝融·····	307
	鲧、共工与玄冥、冯夷·····	321
	禹、句龙与夏后、后土·····	333
	序《古史辨》第七册因论古史传说中的鸟兽神话·····	343
	楚帛书的四季神像及其创世神话·····	354
	秦《诅楚文》所表演的“诅”的巫术·····	373
	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之源昆仑山的神话传说·····	398
<b>卷 六</b>		
	上郡守疾戈考释·····	405
	长沙出土的木雕怪神像·····	410
	汉代门阙前的“栗罍”·····	414
	汉代木明器·····	419
	汉代的多层建筑·····	424
	考明器中的“四神”·····	429
	纸冥器的起源·····	435
	六博考·····	441
	六博续考·····	447
	“幌子”小记·····	449
	古代四川的井盐生产·····	456
<b>卷 七</b>		
	月令考·····	463
	《今月令》考·····	511
<b>卷 八</b>		
	重刊《墨经哲学》前言·····	521
	墨经哲学·····	525

## 卷 九

墨学分期研究·····	653
墨学非本于印度辨·····	687
先秦的论战——中国学术史上有价值的一页·····	702
墨家的世界观及其与名家的争论·····	715
名家考原·····	729
名家言释义·····	733
诸子正名论·····	752
《老子》讲究斗争策略的哲理·····	764
吕不韦和《吕氏春秋》新评·····	777



卷

一





## 重评 1920 年关于井田制有无的辩论

—

1920 年在《建设》杂志上展开的关于井田制的辩论，是五四运动之后第一次有关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这场论战对此后中国古代史的探讨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我们今天还值得重新加以评论。《建设》杂志是五四运动爆发以后由孙中山创办的，目的在于宣传民主革命，阐释孙中山的学说，由廖仲恺、朱执信等人主编。这场关于井田制的辩论，是由胡适挑起的。胡适的对方是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三人。参与辩论的还有吕思勉和季融五。吕思勉是支持廖仲恺的主张的，季融五则完全赞同胡适的意见。

胡适的评论，首先是针对当时《建设》杂志上发表的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一文的。胡适之所以要出来争辩，原因不外两个：首要的原因是，胡汉民在这篇文章中确定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相沿的共产制度；而当时胡适正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不承认阶级社会之前存在过原始共产社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古代本没有均产的时代”。次要的原因是，胡汉民这篇文章试图用唯物观点研究哲学史，正好和胡适研究哲学史的观点对立。胡适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方面，是从 1917 年发表《诸子不出王官论》开始的。他在那篇文章里批驳了《汉书·艺文志》有关“九流”出于王官之说，认为“刘歆以前论周末诸子学派者皆无此说”，这是“汉儒附会揣测之辞”，“诸子自老聃、孔

子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胡适写信给廖仲恺，否定中国古代存在井田制，认为“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也就是当时思想家的“救世”理想。这时廖仲恺、朱执信和胡汉民有基本相同的见解，有些问题还曾共同研究过，他们三人先后参与了这场辩论，一起反驳了胡适的论点。

## 二

胡汉民说：“井田是计口授田，土地公有，古代相沿的一个共产制度。”又说：“井田制是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制未发生前的一种土地共有制度。”廖仲恺还说：“井田制度我假定他是上古由游牧移到田园、由公有移到私有当中的一个过渡制度。”他们两人提出这样的见解，都曾以民族学的调查和欧洲历史上的“均产制度”作比较。廖仲恺在《答胡适之的信》中，曾引用不少当时欧洲的历史著作，用来说明欧洲“均产制度”的沿革，指出“原始社会里的土地是民族共用的产业，依期分给各家”；又讲到“这种原始组织，拿耕地来均分，把非耕地作公用”，在封建时代的农奴制度下“还能保存”；认为欧洲既有类似的例子，就不能否认中国古代井田制的存在。

廖仲恺这样把欧洲“均产制度”的沿革和中国古代井田制作比较，很有独到之见。当然，在古代社会里出现的井田制，不可能就是一种土地私有制未发生以前的土地共有制度。但是不能否认，它确是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农村公社（以下简称“村社”）的土地制度。原始村社的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共耕地，由村社成员集体耕作，收获储藏起来用于祭祖、聚餐、救济等公共开支；另一部分是分给各户的“份地”，按土地质量差别平均分配给每户人家，由各户自己耕作和收获，用来维持生活。“份地”一



般要按劳动力平均分配使用,成年时分配一份,年老时收回;同时还要实行定期重新分配或调换的制度。共耕地上的集体耕作,由村社长老带头进行,每年春耕开始时由长老主持春耕仪式,用来鼓励和组织村社成员集体耕作。所谓井田制,就是进入古代社会以后,贵族把这种村社的土地制度加以变革,使之成为剥削的一种手段。原来的共耕地,称为“公田”,或者称为“籍田”,这时被贵族占有,并加以扩充,作为剥削集体耕作劳动的一种方式,称为“助”或“籍”。原来村社长老主持的春耕仪式,也被改造成为“籍礼”,变成统治者监督从事无偿集体劳动的一种礼制。原来分配给各户的份地,称为“私田”,也还保留按年龄受田、归田和定期平均分配、调换田地的制度。但是,这时的村社组织,已被贵族利用作劳动的编制,实质上已经成为服役的单位,使得再生产在悲惨的条件下进行。因此井田制尽管保留有村社及其土地制度的形式,实质上已经不是原始的村社及其土地制度。

胡汉民所解释的井田制,认为在封建制度(即分封制)下,在卿大夫的采地食邑中,依然保留有这种土地共有制度的形式,卿大夫只是从中取得“什一之征”的收入而已。廖仲恺在《答胡适之的信》中,引用日本学者加藤繁的话,认为《诗经》和《左传》里没有当作私有财产的田土的痕迹,像秦将王翦那样“请美田宅甚众”,到战国末年才出现,因而把春秋以前看作是土地私有制发生之前土地共有的时代。的确,战国时代私有田地的形态,是井田制瓦解以后逐渐产生的,但是我们认为,不能认为井田制存在的时期就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当西周、春秋推行宗法制和分封制的情况下,各级贵族(包括诸侯、卿大夫、士)所占有的采地食邑内,既包括有井田和耕种井田的人民,还占有私有的田和耕作的奴隶。各级贵族是按宗族为单位来占有财产的,其财产单位叫做“室”,而“室”中主要的财产就是“田”。“田”就是每个宗族